

抗战爆发前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 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

居之芬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国内合作交往的大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和品格作风，中外人士也利用机会观察研究中国共产党。本文拟介绍抗战期间外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五次重要考察。

一、斯诺首访保安

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重要考察是人们熟悉的，即1936年6—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访保安。斯诺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考察报导中国共产党的西方记者，是因为他对亚洲和远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中日战争前途的真正关切。

斯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1928年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即到中国，初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其间他曾经在中国内地作长时间游历考察。一年后改任美国“报联社”驻亚洲的“游历记者”，游遍了东南亚和南亚的荷属、法属、英属殖民地各国。在此期间，他看出了欧洲老殖民体系在亚洲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作为观察敏锐的记者，他揭示了这一潜在的危机，并预感到亚洲各国正处在无法扼止的革命和巨变的前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认定这一事变必将成为“时代的大新闻”^①，决定留在中国观察和报导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其后他又目睹了上海军民一二八抗战，结识了宋庆

^① 《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卷，第96页。

龄和她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朋友，开始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和另一类中国人。为便于观察中日战争的发展并深入了解中国，1933年斯诺结婚后在北平定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并进修中文。由于北平有利的观察位置，斯诺较早地认识到：日本侵占中国的目的，并非象某些西方人士一厢情愿地推断的那样，为向俄国人开战，而是“想以中国为根据地，向整个欧洲（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发起总攻。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①所以他极力主张美国必须密切关注这场即将爆发的大规模中日战争并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他不主张美国直接参战，因为根据他对对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观察，即使美国直接参战付出重大代价而赢得战争胜利，也未必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决定中国和亚洲的命运。他认为明智的作法是支持和帮助正在觉醒的亚洲和中国人民增强武装自卫的能力。正是从这点出发，他和一些西方记者积极支持和赞助了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爱国斗争。

他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节节妥协退让，对内严厉镇压反日活动并集中全力于剿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做法，深感困惑和不满。他又从宋庆龄等进步人士那里得知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他极想搞清：（1）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究竟是些什么人？执行什么政策？在中国至关紧要的对日战争中是积极因素，还是“祸患”和“阻力”？“剿共”内战还应不应该打下去？（2）国民党“剿共”九年，付出了重大代价，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屡“剿”不“灭”，反而在西北又重建了根据地？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他们那样坚韧、顽强，甚至他们的敌人私下也承认他们整体的“无敌”？正是这些疑问，使斯诺在1936年春萌发了冒险考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计划。6月，他从燕大东北籍学生那里得知奉命“剿共”的东北军已与“红军”达

^① 《斯诺文集》第1卷，第180页。

成了“停火抗战”协议，认为有了千载难逢的进入“红区”考察的机会，便在夫人尼姆·韦尔士全力支持和几家英美报社和出版商的秘密赞助下^①，通过宋庆龄取得了进“红区”的“通行证”^②后，踏上了考察“红区”的冒险旅程。

斯诺在4个月里对中国共产党的考察是全面深刻的。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对内政策重大调整时期，较少战事，可以相对从容地接待第一位来访的西方记者。斯诺熟知中国情况，善抓要害问题，且极为勤奋，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斯诺首先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社会组成、主要主张和赖以发生发展的社会根源。他和夫人尼姆·韦尔士两次访问红区先后访问了50多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高级将领、行政长官以及许多红军中下级军官、士兵、普通农民，搞清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成分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贫困破产的农民的结合体。它的基本主张是中国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挽救民族，实现独立和民主改革，才能实行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斯诺研究了这些人参加革命的原因，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中国官僚买办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近代中国极端衰弱的现实，是使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易于接受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一切旧制度、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源，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发生和发展的深刻社会根源。斯诺认为，与某些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是为民族解放和进步，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真诚革命者，因此他们“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③

① 主要指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和兰登书出版社哈里森·史密斯等。

② 指斯诺通过宋庆龄得到一封地下党给毛泽东的介绍信。

③ 《斯诺文集》第2卷，第423页。

斯诺详细听取了中国共产党对日益迫近的中日战争的全部见解，他十分赞成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的政策，钦佩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的“神奇远见”，认为他们关于中国为求胜利必须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是“准确的判断”。^①他成为第一个向公众公开转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方信使。斯诺饶有兴致地重点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才能和作用。他认为，毛泽东是“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②与中国诸多政治领袖比较他最大的特点是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深刻了解和对其要求的最精辟恰当的概括和表述。他预示，倘若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的要求和农村革命是复兴中国的重要动力，那么毛泽东“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③

斯诺还专赴陕甘前线了解刚刚会师的主力红军。他认为，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红军的建军和教育原则无疑为中国旧军队的改造和进步提供了成功经验。斯诺还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区域内的政权工作及财政税收、经济文化等方面政策与实施情况。最后他还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

斯诺通过考察基本上回答了当时中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提出的所有重要疑问。他第一次冲破国民党当局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设置的人为的“坚固长城”，把中国共产党、红军、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中国和世界人民，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对促进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是有益的。

这次考察之后斯诺陆续发表了系列报导——《红星照耀中国》、《红色中国杂记》。他以其诚实的态度、丰富生动的资料和深刻的分析，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亿万读者。这些报导成为当时和现在中外政治家、史学家研究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由来、发展、特点和中共主要政策的重要资料根

^{①②③} 引自《斯诺文集》第2卷，第423页、3页、第66页、第67页。

据。

二、贝特兰、卡尔逊考察抗战初期的八路军

1937年10月至1938年8月，受斯诺夫妇影响的两位英美人士——英国记者（新西兰籍）詹姆斯·贝特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上尉（后升任上校）进行了外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重要考察。

贝特兰是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公开接谈的一位外国记者。1936年1月，他来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进修中文时结识了斯诺夫妇并成为他们的挚友。1936年12月中旬，由斯诺夫妇推荐，贝特兰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分随一名东北军军官急赴西安采访报导“西安事变”，次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新生》）。1937年春，为了捕捉日本法西斯策划侵略战争的信息，贝特兰赴日本东京采访。7月8日，他得知在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立即兼程赶回中国。“在北平被围以前……正好赶回华北，进了北平城”。^①在北平，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怯懦因循最不景气的抵抗”，十分失望，但“仍旧相信日本当前的作战目标还是华北”。^②八九月间他与众多外国记者撤离北平时，受斯诺启示，决定赴西北寻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写道：“倘使我要多看点北方的战争，那么要跟八路军在一起”，并希望继续斯诺未完成的考察：“在这个举国一致抗日的战争里面，中国的红军将要占一个什么地位”，“在这新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将怎样行动”，“以他们轻兵器的实力，怎样才能有效的去和日本强有力的飞机大炮对抗呢？”^③

1937年10月贝特兰由斯诺介绍从西安到达延安，首先就中

^{①②③} 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334页至335页。

国共产党对这场中日战争的基本见解，三个月来中国战场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将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路线和政策，克敌致胜的主要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经毛泽东批准他随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前线作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贝特兰考察的路线是从临汾附近的八路军总部到离石一二〇师师部，然后到达晋北同蒲路沿线忻县、原平、代县、崞县等地的一二〇师及所属王震所部三五九旅驻防地，再从原路返回。他采访了一二〇师及所属三五九旅，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山西参加的主要战役、战斗以及民众动员情况等。

与贝特兰几乎同时考察八路军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上尉。卡尔逊是位勇敢、正直、富有实战经验的职业军人。他是美国弗蒙特州人，16岁即在美国陆军炮兵服役，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初他随美国海军陆战队来中国，目睹了中国内部复杂巨变的重要一页。1933年初他调任北平美国驻华使馆副卫队长，与斯诺夫妇成了好友，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社情。1935年卡尔逊奉调回国担任罗福斯总统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别墅的副卫队长，并在华盛顿大学学习研究《国际法》，分析研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卡尔逊重返中国任海军陆战队情报官。赴任前，罗斯福总统特邀卡尔逊任他在中国的秘密观察员，请卡尔逊将在中国看到的一切连同本人的见解，直接写信报告他。^①

卡尔逊1937年8月中到上海，恰巧目睹了淞沪战役最剧烈的一幕。作为战地观察员，卡尔逊深为中国军民所表现的民族团结和顽强抵抗精神所鼓舞，也深为中国军队缺乏在阵地战中打败日军的装备，缺乏有力的训练和指挥而忧虑。他认为，淞沪战役显示的中国军民在民族自救事业中忍受艰辛和共同合作的精神，如能扩展到全国并得到明智的引导，是能抵消日本在现代装备和

^① (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149页。

组织上的优势的。从在沪的斯诺那里听说北方的共产党八路军已开始这样做，他决定亲自去看看。在通过斯诺征得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并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批准后，1937年12月他穿越日军战线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卡尔逊是从西安乘车直抵山西临汾附近的八路军总部的。在那里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人系统地向他介绍了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和计划。八路军游击战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原则。之后他穿过多道封锁线，到达八路军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进行实地考察。八路军的游击战和政治工作情况，使他大开眼界，极为振奋。为了验证他的考察，也为全面了解华北敌后民众动员和国共合作情况，1938年5—8月，他再次由西安经延安到绥远、晋绥、晋察冀、冀中、冀南和山东，考察了八路军在华北初创的根据地及作战情况，国共合作和民众动员情况等，并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这次考察历时4个月，行程一千五百英里。

这两位英美人士，一文一武，对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军事部署、军事方针和军事行动的实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贝特兰说：“共产党是知道制服日军的正确方法的唯一的军队。”他们主张：“……在运动战中，对开动着的敌人的侧面或背后的突击，可以减轻防御者在武器上的不利，使长于肉搏的中国军队，能和日本步兵作对面的搏斗。”^①卡尔逊说：“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②这次考察，及其后发表的系统报导——《华北前线》（贝特兰，1939年在英美同时出版）、《中国

① 《华北前线》，第173页、81至82页。

②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9页。

的双星》、《中国的军队》等（卡尔逊，1939至1940年在美国出版），为中外军事家史家研究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军队在华北参加的战役战斗，研究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采取的战略战术及趁敌不备在敌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见证。特别是卡尔逊，作为一名实地考察过国共军队在抗战初期主要战役战斗的有实战经验的军事观察家，他的比较和总结更具有实际的军事价值，在中日战争期间曾对美国驻华军方和罗斯福总统产生过重要影响。

三、林迈可、班威廉记载根据地渡难关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夫妇，班威廉夫妇，美国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经理吉姆·霍尔，法国海军军官乔治·乌尔门和海关职员M·当儒，荷兰电气工程师布朗迪斯特，奥地利医学博士弗雷和德国姑娘布莱奈克等一批滞留平津的外国人，被中共地下党营救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延安，生活了数月至数年，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经历了根据地建设的重大事件。他们于1943年后陆续取道重庆回国，在延安、重庆期间和回国后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斗争和根据地的观感和印象，如乔治·乌尔门的《从北平到延安》、林迈可的《晋察冀印象记》、班威廉的《我怎样来到晋察冀边区》等。^① 其中，向被视为保守的共和党人的吉姆·霍尔先生到重庆后给美国驻华使馆写的一份关于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曾在大后方重庆和美国官方人士中产生过重大影响。^②

在这些人当中，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不仅在中共区域生活的时间最长，还承担了根据地的具体工作，经历了从1941年底到1945年敌后根据地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他们的考察和报导

^① 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4月版，第2页。

^② 《河北文史资料》第20辑，第41至42页。

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1937年12月林迈可受燕京大学聘请来华，曾任燕京大学经济学、逻辑学等课程的讲师、教授。1938—1939年假期，多次与燕大教师一起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访问考察平津周围的抗日根据地，十分欣赏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组织民众抗日的英勇精神和讲求实际的战时政策，成为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的积极支持者。从1938年夏起，他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燕大学生李效黎一起经常为根据地购买急需药品、无线电器材和营救护送地下党员，因此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不过，林迈可夫妇在日本宪兵抓捕之前，与班威廉夫妇一起冲出了日军封锁线，从北平西山由中共地下武装护送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因林迈可擅长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被晋察冀军区聘为“通讯处技术顾问”。从1941年底到1944年春，林迈可为改进晋察冀军区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曾为沟通英国当局与中共敌后战场的军事情报联系作出过重大努力。^① 1944年5月到延安后，他又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继续为改进八路军通讯技术，打通中共区域与外界的联系，向世界人民介绍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军民的抗日斗争作了重要贡献。直到1945年11月抗战胜利，他们才举家取道重庆回国。此后，林迈可曾先后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等校的讲师和研究员。1959年起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1975年结集出版了他对这一段经历的系统报导《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

班威廉，是英国自然科学工作者。1930年即携夫人克莱尔来华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在长期的教学科研活动中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根据地的班氏夫妇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和生机勃勃的抗日斗争所鼓舞，

^① 《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第48、79页。

决定留下来参加抗日工作，以便亲眼看看日本法西斯怎样被中国人民和同盟国军打败，中国人怎样收复失地和重返平津。他们为晋察冀军区主办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讲授高等物理、数学和理论电磁学等课程。在近两年的教学中，他们研究每个学员参加革命的经历，分析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他们留心考察和记录了根据地建设的重大活动和各项成就，并确信他们看到的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①。1943年10月，班威廉夫妇由延安取道重庆回国，在穿越国民党防线时，又目睹了国民党大军封锁中共区域的“铜墙铁壁”，饱尝了国民党当局对从中共区域出来的中外人士所实施的“白色恐怖”。1944年初他们刚到重庆即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不得不滞留在重庆做国民党当局要他们做的“洗脑”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们才重返英国。不久他们又转赴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48年他们在英国撰写出版了《与中共相处两年》（中译本名《新西行漫记》）一书。

林迈可和班威廉夫妇对中共区域的考察和报导，分别以他们在“红区”生活时间长，所记事件均系亲身经历为显著特色，其价值实非走马看花访问者所能比。他们的考察与报导为人们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特别是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如何战胜日军的“蚕食”、“扫荡”、“封锁”，并取得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他们的著述中，林迈可偏重于对根据地军事系统的考察报导，诸如对中共军队的指挥、通讯、情报和后勤供应乃至根据地的民兵地雷战等均有生动详实的记录；班威廉夫妇主要考察和报导了根据地政府系统的工作，诸如对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和民主政治实施情况，边区经济政策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边区

① 班威廉、克莱尔著：《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97页。

自然科学技术大会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成就等。

四、外国记者参观团考察反攻 阶段的中国共产党

外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重要考察，是1944年5月至11月，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代表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专程考察。

各国新闻记者从1943年起就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到中共区域考察事实真相的要求。1944年初在重庆的所有外国记者（共一百几十人）联合签署了给国民党当局的郑重请求书。^①蒋介石被迫在这年2月同意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和中共区域考察。

“中外记者参观团”由外国记者（6名）和中国记者、翻译（15名）组成。他们于1944年6月初到延安访问了6周后，除夏南汉、神甫等随国民党人员返回重庆外，大部分外国记者留下来，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深入考察。其中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美国《时代》杂志和《劳动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M·武道以及7月下旬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伯格少校等，于8—10月赴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作实地考察。他们目睹了晋绥边区最前沿——第八军分区军民在向敌伪展开局部反攻作战中，如何开展神奇的“地雷战”，如何逐个围困、挤压、摧毁日军的据点碉堡，迫使日军收缩战线；还亲眼观看了八分区夜袭汾阳城和拔除娄烦大据点的壮观的战斗过程。留在延安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则集中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建立的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

^① 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页。

度，对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改革等方面政策实施情况以及各界人士的拥护程度，作了深入的考察。他还搜集资料，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七年来军事实力的发展，战场上的成就，以及在太平洋战区战略反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考察和论证。

这次外国记者团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中，陆续向国外发出了数以百计的通讯稿，后来还出版了系统报导著作——《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哈里逊·福尔曼，1945年）、《红色中国的挑战》（冈瑟·斯坦因，1945年）、《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泼斯坦，1947年）等，它们运用在考察中所得之丰富资料，具体报导了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和实行民主的情况。其中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又名《北行漫记》）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次中外记者参观团考察的全过程和见闻，证明了1944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较早地转入了生机勃勃的局部反攻作战。《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作者冈瑟·斯坦因是位熟知远东政治又颇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和名记者，他的书注意从统计数字分析论证，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贯彻统一战线方针和新民主主义政策及根据地建设成就。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则不仅述及这次考察，而且记叙了中国自1840至1947年百多年内所发生的深刻革命和变革。由于作者对中国人民和革命一往情深，该书搜集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各个战场和角落的丰富的史料，实际上成为一部较完整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为研究抗战时期国共两个不同的战场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路线及其产生的不同结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作者还把中国抗战和革命放在亚洲和远东巨变的政治大舞台上阐述了它的深刻的国际意义。

这次考察后期，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研究生白修德在“史迪威事件”发生后，为了趁美国还没有关闭通往中共区域的通道，抓紧时间了解延安“那些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于1944年10月飞往延安作了一个多月

的考察。白修德1939年哈佛大学毕业后即来中国，他久居重庆又在国民党新闻机构任过职，对国民党政权和国统区情况以及中美关系内幕十分熟悉。为了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他探寻代表中国民主进步和稳定的新的因素。他在延安重点访问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研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指导理论、作风及抗战期间的主要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1946年他与美国《生活》杂志女记者贾安娜合著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一书记载了这次考察结果。该书是抗战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出色的考察报告。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深刻地指出：“当蒋氏设法一面对日本打，一面保持旧制度的时候，他就不仅没有能够打败日本，而且无力维持自己的权威了。共产党人，他向来的死对头，却从一支八万五千人的部队生长成为百万大军……。中共并没有施用魔术，他们明白人民所需要的变革。他们发动了这些变革。”^① 该书还对美国在抗战后期对华政策中犯了错误并终于“失去”了中国大陆等作了分析。该书在当时和现在始终受到美国新闻界学术界的好评。^②

五、美军观察组考察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抗战期间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次重要考察，是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对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考察。

这次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触的非同寻常的行动，是由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驻华使馆部分官员提议，史迪威将军支持，罗斯福总统直接批准推动，并由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具体负责实施的。

^{①②}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17至18页，第5页。

早在1943年，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即对搞清共产党在敌后的抗日实力及其在同盟国对日反攻作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扩大美军在敌后的情报来源，发生浓厚兴趣。1943年6月和次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兼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正式向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向中共区域派遣观察使团必要性的两份备忘录，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罗斯福于1944年二三月间敦促国务院，并两次直接给蒋介石拍电报提出美国要向中共区域派一个军事观察使团的意见，请蒋合作，但均遭蒋的强硬抵制而毫无进展。1944年春夏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及由此而引起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全面爆发，终于使罗斯福下决心迈出向中共区域派遣军事观察组的重要一步。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一则劝蒋作些改革，容纳更多的抗日民主力量以防国民党政权在最后阶段的崩溃；二则力促蒋同意美国向中共区域派观察组的行动。在巨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6月24日同意了这次行动。^①

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直接派遣的“军事观察组”由各兵种军事情报官和政治顾问两部分人组成。7月21日给该组下达的指令是：1.搜集敌伪军方面的情报：包括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军事实力和行动，敌军在华北的空军机场、防空能力，被盟军轰炸的目标损失情况，敌后气象资料，经济情报及有关战略目标情报等。2.考察中共军事实力：党政军官员名单，部队序列、实力、位置，作战部署，装备和训练情况，实际战斗力和行动，中共获取敌军情报能力，中共区域的准确范围等。指令并要求对中共军队在战争全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潜力，盟军援助的价值和方法提出具体意见。^②史迪威特意为观察组挑选了能受中共尊重并能作出较为客观结论的组长——包瑞德上校，戴维斯则为观察

^{①②} (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9页，第31至32页。

组起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名称——“迪克西使团”（以纪念它非同寻常的使命）。

观察组于7月22日和8月7日分两批飞抵延安，首先听取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叶剑英关于八路军的发展、序列、实力、部署、军事行动、战略战术等综合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林彪、聂荣臻、陈毅关于敌后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情况的报告，走访了中共党政军主要领袖和官员，观看了王震三五九旅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同时各兵种情报官和气象专家开始搜集敌后的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九十月间，观察组先后派出以科林上尉、希契上尉、约翰中尉3人和以彼得金少校、卢登外交官、多姆克上尉、多兰上尉、惠特尔赛中尉等5人组成的两路考察组分赴敌后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作实地考察。赴晋绥的一路，由于事先有外国记者参观团和卡斯伯格少校的详尽考察和报导，所以很快于11月5日返回延安。而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考察的一路则颇富艰险和传奇。在通过敌占区和封锁线时，惠特尔赛中尉和一名陪同的八路军摄影记者因误入敌区而牺牲，八路军为抢回惠特尔赛中尉的遗体也付出了整整一营人的代价。到最远的晋察冀边区考察的一行人于当年11月到达边区中心区，1945年3月才返回，考察了整整三个月。其中彼得金、多姆克、多兰三位军官分赴边区平津以南的三个分区冀晋、冀察、冀中实地考察。他们走遍了三个分区的各个角落，有的深入到敌占区平汉路边缘，有的到距北平、天津仅一、二百里的地方，主要核实了根据地的地域范围，实际兵力，军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装备情况和实际作战能力及地雷战地道战等，还重点搜集了驻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日军情报和军事设施情况，了解保定飞机场和渤海湾滩头阵地的使用价值和利用的可能性。考察平津以北的冀热辽分区，因交通阻断未能成行，但恰有被根据地人民营救的7名美国飞行员来到中心区，带来了完整的情报。留在中心区的政治顾问雷·卢登则考察了边

区的经济政策、大生产运动、民主政治实施情况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反应等。赴冀中的多兰上尉不仅考察了冀中平原规模宏大的系统地道工程，还在白洋淀附近的任邱县皮里村与深夜突袭的大股日军遭遇，亲身经历了一次地道战，目睹了地道在遭敌突袭时的“五防”^①功能。在战斗中，因敌军来得迅猛，多兰来不及把所带物品藏进地道，被敌发觉暴露了身份。房东大娘为了保护美国朋友的安全拒不说出地道干线，被残暴的敌人砍成重伤^②，这是中美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动人事例。

美军观察组这次历时9个月多达30人的大规模考察主要偏重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考察。它基本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和抗日斗争的介绍，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在抗战全局中的地位作用。一些文职官员如谢维斯、卢登等也对中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各方面的政策、实施情况和性质作了考察，并对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保持必要的联系，以保证中国在战后的和平稳定发展，保证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做了有益的论证和预测。这些考察结果都陆续写成大量的军事政治报告，上报给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有些考察结果则反映在外国记者团和白修德等人发表的系统报告和观察组成员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如卢登1945年4月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如包瑞德1970年出版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等）。这些报告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战略反攻阶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发展和成就，战略态势，及在对日反攻中具有的重要价值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① “五防”为防毒、防水、防钻、防挖、防火攻等功能。

②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9期，第159至162页。